

明清以来淮安清口闸坝体系考辨*

张鹏程* 路伟东*

内容提要 淮安清口是明清大运河与黄、淮的交汇点。明代后期以后，历任河臣在这里推行不同的治河方略，逐渐产生了以闸坝为核心的复杂水利体系，由此催生出成序列和多版本的河工图。本文利用河工图信息，结合相关文献，高精度还原了清口地区闸坝设施演替的细节，发现并纠正了已往研究的部分错讹，对官方闸坝命名权与民间闸坝解读权间存在的重大差异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关键词 大运河 清口 河工图 闸坝体系

Research on the sluice system at the southern canal exit of the Qingkou junction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Pengcheng

Abstract Qingkou, Huaian is the jun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Huaihe Rive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Successive water officials have pursued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river management here, gradually producing a complex water system with sluice control as the core, resulting in serialized and multiple versions of ancient maps of the Yellow River. By using these map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restated the details of sluice succession with higher accuracy in Qingkou, found and corrected some mistakes in previous studies, analyzed and expound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fficial right to name the sluice and the folk right to interpret the sluice.

Key words The grand canal , Qingkou, ancient maps of the Yellow River, sluice system

* 基金项目：2018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大阪产业部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8ZDA188。

* 张鹏程，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经济地理、苏北地区水利与两淮盐运等方面的研究。

* 路伟东，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尤其专注于清以来西北人口、回族人口以及历史 GIS 与传统历史地理学交叉研究等。

明清大运河全长近 1800 公里,自南而北贯通五大水系,因地形起伏并联通众多自然河道,沿途闸坝众多。这其中,位于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的清口是大运河汇淮与穿黄的关键控制枢纽。^①明代中叶以后,在黄河夺淮的大背景下,为确保漕运畅通,官方治黄以阻黄河倒灌清口为要,治淮以使淮河畅出清口为主,而治运则以使运河安渡清口为核心。清口“施工之勤,靡帑之钜,人民田舍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②故而,治理黄、淮、运的国家要政彼此冲突又相互关联的毕萃此一隅。

由于清口形势紧要,历史资料积淀丰富,后世研究成果亦较多。比如,清代河臣麟庆很早就绘制了清口变迁的历史地图,民国武同举对此亦多有补益^③;当代学者中邹逸麟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历代治河文献,从宏观视角对清口在内的淮河下游运口变迁做了复原^④;李孝聪等整理了明代中后期以来的清口地区河工图,对一些重要地图的版本、制作和流布等做了探讨。^⑤总体来看,既有研究虽然丰富,^⑥但对清口地位最重要,变化也最频繁的闸坝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复原工作一般止于示意,且存在不少错讹。^⑦近年来,随着河工图等原始文献的披露,使用这些序列化的工程图纸来直观复原河道与闸坝形势,日趋受到学者关注。^⑧在此基础上,如果再结合有关水利文献,综合运用近现代测绘地图等资料,还是能够对相关问题展开更深的讨论。

^① “清口”是历史时期自然变迁与人类改造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清口”的概念既曾寓意天然河流淮河与泗水的交汇点,也寓意以码头镇为中心,因工程实践而形成的水利枢纽区域。近年来因大运河申遗之故,“清口”亦被专称为“清口枢纽”。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857页;国家文物局:《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修订稿)》,办保函(2011)638号,2011年9月8日。在本文中,如无特定说明,“清口”均指区域概念。

^② 《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3770页。

^③ (清)麟庆:《黄运河口古今图说》,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沈云龙主编:《中国水利要辑丛编》第1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7-53页;(民国)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淮系年表弁图·淮系历史分图七至十二》,[出版者不详],民国十八年(1929),第4-6页。

^④ 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历史地理》第6辑,1988年,第65-69页。

^⑤ 李孝聪、席会东:《淮安运河图考》,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王耀:《〈黄运河口古今图说〉图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以下正文中,两书分别简称为《图考》和《图注》。

^⑥ 众多研究分别涉及清口的历史演变、地域文化以及考古保护等,如王英华:《洪泽湖-清口水利枢纽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明清时期以淮安清口为中心的黄淮运治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著:《淮安运河文化研究文集(第三辑)》,河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118页;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南京博物院:《京杭大运河清口水利枢纽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

^⑦ 武同举在《淮系年表弁图》中对南运口闸坝的细节有意留白处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针对清口枢纽整体有新绘地图,但实质是对咸丰《清河县志》附图的数字化,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03-207页;咸丰《清河县志》卷1《图说》,民国八年(1919)再补刻本,“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方志丛书)·江苏”第204册,第7-16页。

^⑧ 王耀利用河工图对清口的木龙工程、东西坝工程、陶庄引河工程进行了讨论,但并不涉及运口内闸坝系统。见王耀:《古地图所见乾隆朝清口地区河渠治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3期,第128-135页。

一、 潘季驯治河前后的清口单闸单河系统

明代初年，黄河沿颍、涡、汴、泗等多条汉流夺淮入海，由于清口只是这些汉流与淮河的交汇点之一，因此当时清口的水势还比较平缓。明永乐十三年（1415）前后，平江伯陈瑄开凿新运河入黄时，在运口设置了一座新庄闸，该闸闸门直对黄河，无需任何减水设施，便对应了这一时期的总体河势。后来，因为新庄闸濒临正德年间朝廷敕建的惠济祠，故又被称为惠济闸，这是清口地区最早冠名“惠济”的闸坝。^①

嘉靖三十一年（1552），运口与运道还曾短暂移动到洪泽湖，是为三里沟河，但很快就淤废。^②其后至万历年间，河臣潘季驯采取“束水攻沙”与“蓄清刷黄”的治河策略，^③将黄河河道固定于今废黄河一线，主流只在清口与淮河、运河相交。这使得清口的河势陡然变得剧烈起来，新庄闸既受到黄河河水的冲击，又受制于黄河泥沙的淤积，渐渐不可维持。^④

有鉴于此，潘季驯于万历六年（1578）废止新庄闸，在惠济祠以南新设置一座通济闸，并在通济闸西南开挖新运口，“离黄向淮，用清避浊”。^⑤由于新开的万历通济闸与永乐新庄闸同处运道，且有前后相继关系，因此，通济闸也继承了新庄闸的别名，亦称惠济闸。

相较于明代中前期，经过潘季驯治河后的清口地区，最主要的变化只是单个运口和单座闸坝的南移，并无主越河或主越闸之分，无论是闸坝形态还是河道形态都比较单一，详见图 1。

^①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 6《川渚下》，光绪二年（1876）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55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影印本，第 891 页。

^② 《明史》卷 85《河渠志四》，中华书局，1974 年标点本，第 2094 页。

^③ （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 2《河议辩惑》、卷 7《两河经略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76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影印本，第 181 页、第 248 页。

^④ 《明史》卷 84《河渠志三》，中华书局，1974 年标点本，第 2083 页。

^⑤ （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 11《查议通济闸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76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影印本，第 36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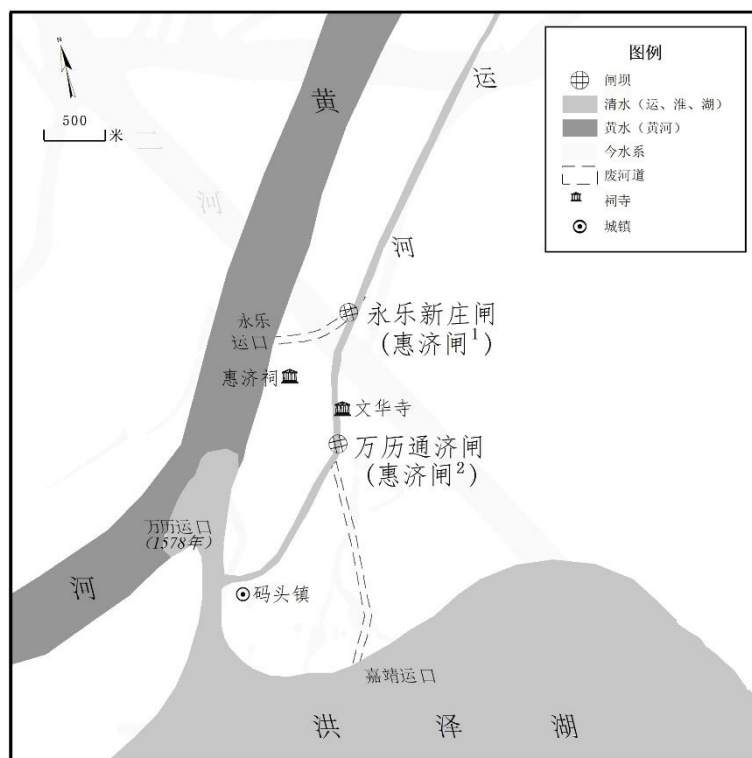


图 1 万历六年（1578）至清初的清口地区闸坝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本图由笔者综合多源数据绘制。^①

二、 靳辅-张鹏翮治河时期“避黄引运”策略下的正越闸河体系

明清易代之际，黄淮运交汇的清口无人问津，附近地区水患连绵。康熙初年，高家堰连续决口两次，第二次几乎使高堰全线崩溃，洪水突入里下河，运道断绝，“江、高、宝、泰以东无田地，兴化以北无城郭室庐。”^②

这种严峻的局面，提示晚明潘季驯以来的治河实践迫切需要改变。在潘氏“蓄清刷黄”的思路下，清口无遮蔽的暴露在黄、运交汇处，以使来自洪泽湖的清水充分涌出，有力地冲刷黄河泥沙。但在清初河工还力有不逮，黄河还持续肆虐的基本条件下，河（黄）势本就强于淮（清）势，刷黄策略并不现实，当务之急不

^① 今河道使用 1:25 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古河道参见（民国）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淮系年表弁图·淮系历史分图七》，[出版者不详]，民国十八年（1929），第 4 页；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历史地理》第 6 辑，1988 年，第 65 页图 2。与两者不一致处为本文考证位置。古今地名对照参考了两幅近现代测绘地图，分别是（民国）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淮阴城（淮安、淮阴）》，1:5 万，民国二十五年（1936）八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经济部地图全宗，江苏省系列，档号 P/11-B-1311；空军航空摄影测量团：《三树》，1:5 万，1956 年航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藏，历史地形图全宗，档号 TD411G-EI500080-094B.1958，TD0B-2013024。地理配准的参考点为惠济祠、文华寺与码头镇，三点的可靠性参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京杭大运河清口水利枢纽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 年，第 70-71 页。以下地图同。

^② 《清史稿》卷 126《志一百一·河渠一》，中华书局，1976 年，第 3719 页。

是刷黄，而是避黄，更重要的是同时引运，以维持运道。

因此，康熙十六年（1677），安徽巡抚靳辅担任河道总督后，在工程实践中更侧重的是“避黄引淮”。他主持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开凿独立于黄河的中运河，^①此后，黄运基本分离，清口的水利枢纽雏形显露，这是黄运关系史上的重大变革。^②

其后，靳辅及其继任者张鹏翮不断实践各种治河措施，对清口地区的河道、闸坝形态造成了重大影响。明万历以后至清初的单河道、单闸坝河工体系被更为复杂的水利系统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河工建设旷日持久，闸坝设施兴废更迭，闸坝名称穿插借用，后世遂对相关河工细节的了解模糊不清，讹误频出。

1. 康熙十八年以后的河道体系与惠济、天妃两闸的名称混淆

康熙十八年（1679）以后，靳辅将治河重心投向清口地区，相较于明代，此时的闸坝与河道形势发生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其一：码头镇以北的万历运口废弃，新运口迁至码头镇以南，该段河道因经天妃闸入引河，故称天妃闸河；其二，从文华寺以北向东南开凿了一条半圆形的越河，该段河道因经七里闸入引河，又称七里闸河。天妃闸河与七里闸河先后汇入引河后，经运口的清水闸一并通过运口，最终北入黄河。^③

由此，在避黄引运的新目标下，清口地区产生了正、越两条运道和东西数座闸坝。单一的运道形态被两端相交的正、越河运道形态所取代，整体形状类似一同心椭圆，见下图 3。

尽管运道的演进过程比较清晰，但对于构筑在这些运道上的数座闸坝，后世研究者则对其具体位置及名称意见纷纭。其中问题的核心，在于对惠济闸与天妃闸名实关系的判断上。

比如，光绪《清河县志》载：“惠济闸，原名新庄闸，又名天妃闸，旧在惠济祠后，明永乐中陈瑄建。”^④可见，在时人理解中，惠济闸即等同于天妃闸。当代学者邹逸麟对清口水利研究颇深，在有关地图中绘制了清口相当多的小地名，

^① 咸丰《清河县志》卷 1《图说》，民国八年（1919）再补刻本，“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方志丛书）·江苏”第 204 册，第 8 页。

^②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年，第 19 页。

^③ 王英华：《洪泽湖-清口水利枢纽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明清时期以淮安清口为中心的黄淮运治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年，第 88 页；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历史地理》第 6 辑，1988 年，第 66-67 页。

^④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 6《川渚下》，光绪二年（1876）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55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影印本，第 891 页。

也是有惠济闸而无天妃闸。^①那么，惠济与天妃二闸，在这一时期究竟是否为同一闸坝，如果不是，他们分别又设置在何处，彼此又有怎样的关联，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武同举的相关论述，集中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实质。他认为：“（康熙二十三年）改建南运口七里闸，名惠济闸，建南运口清水新闻以为天妃闸外护，天妃闸即万历通济闸。”^②以此首先可以明确，至少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天妃闸与惠济闸确实是独立的两座闸坝。

但是，如果全盘认同武同举“天妃闸即万历通济闸”一说，则又颇有不合理处。首先，据新绘地图量算，万历通济闸（武同举称天妃闸）在靳辅治河时代，距离运口的清水新闻已约 2.5 千米，^③远非濒临河口可言，既然如此，新建的清水新闻，必定不能成为深居运道腹地的天妃闸外护。

其次，康熙帝本人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两闸并非一处，《行水金鉴》载：

“（康熙二十三年），（上）问：‘天妃闸这样险，何不再造一闸分减水势？’，臣辅奏：‘已有七里闸一座，’上云：‘这闸造得有理，连声称好。’上见运口新闻，问云：‘这闸是为何而造？’臣辅奏：‘臣恐黄水大涨，天妃闸不能承当，所以又造这清水闸束水，专为天妃闸而设的。’”^④

显而易见，运口的清水闸“束水”，就是专为天妃闸减水而去，如果天妃闸不能濒临运口，清水闸之建将毫无意义。

最后，道光时期河臣麟庆绘制的《黄运运口古今图说》，更为我们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明。在该书的“康熙十五年后河工图”中，天妃闸和惠济闸被分别标志，惠济闸为东西向，天妃闸则为南北向，且彼此相距较近。考虑到麟庆曾任河道总督，这一在清代河图中仅见的标注内容显得颇具权威性。

^① 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历史地理》第 6 辑，1988 年，第 69 页图 3。需要注意的是，邹先生在同页脚注 1 中指出地图画法等研究是“综合诸家之说”。

^② （民国）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淮系年表》表 11，[出版者不详]，民国十八年（1929），第 13 页。

^③ 清水新闻与万历通济闸的名称在历史上只各出现一次，内涵外延均非常清晰，相关考古发掘已进行了明确定点，因此可以量算两点间精确距离。参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京杭大运河清口水利枢纽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 年，第 50-54 页。

^④ （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 135《运河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8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影印本，第 20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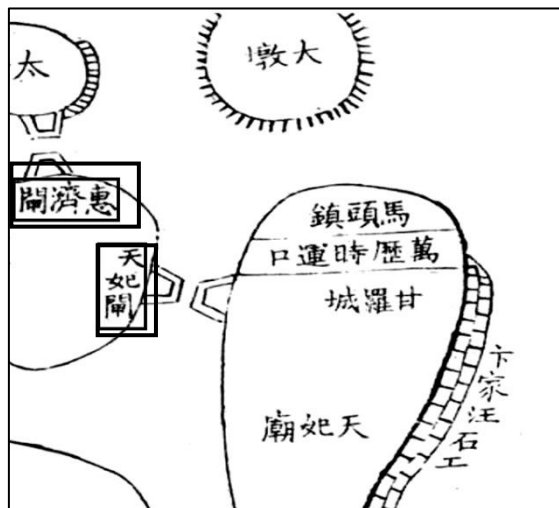


图2 《黄运古今河口图说》中的惠济闸与天妃闸

地图说明：断限为康熙十五年（1676）以后，上南下北。图经笔者二值化处理，框为笔者添加。

资料来源：（清）麟庆：《黄运河口古今图说》，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沈云龙主编：《中国水利要辑丛编》第1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18页。

根据以上分析，基本可以明确，把惠济闸等同天妃闸的观点实有讹误。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多座闸坝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可能被冠以同一个名称，但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同一个名称只能指向其中某一座闸坝。后世文献中一座闸坝对应多个名称的现象，大都是时间层累的结果，这其中有很多是不准确的。天妃闸与惠济闸的混淆就是如此。

建设于康熙十八年（1679）的运口处新闻，名称之所以要舍弃“惠济”而易为“天妃”，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清口地区皇家祠庙——惠济祠名称发生了改变，更具体来说是该祠的主祭信仰发生了改变。康熙初年，由于官方对天妃信仰的尊崇，明代命名的惠济祠更名为天妃庙，“本朝即其旧宇，崇祀天后，遂称天妃庙。”^①已有学者研究表明，“闸名变更背后当隐含神灵奉祀的内在机理，与此相关的则为祠庙之名的易变。”^②当这种祠庙尊崇传导到闸坝尊崇后，新建的、又有控遏运口重要地位的天妃闸之得名“天妃”，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除了官方推崇这一因素，“天妃”与“惠济”两词在文本背后的内涵与隐喻，也是闸坝名称变化的原因之一。“天妃”所代表的妈祖信仰具有明确的神灵指向，

^①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3《建制》，光绪二年（1876）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864页。

^② 王聪明：《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第46页。

即底佑来往船只安渡河势凶险的清口地区，“惠济”一词相较之下，则显得语意含混，没有特别的信仰指向。

以上两种因素间的关系，并非彼此割裂：“惠济”、“天妃”之间的内涵差异只是闸名差异形成的表象，它们本身是民间信仰长期演化的产物，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只有当官方权威话语介入，并有意识的寄托其对河工治理的良好愿望后，天妃闸才能成为“天妃”闸。这既是闸坝命名复杂化的根源，也是对康熙时期“治水政治”的一个典型注解。现将天妃闸的位置标示于图 3，以济直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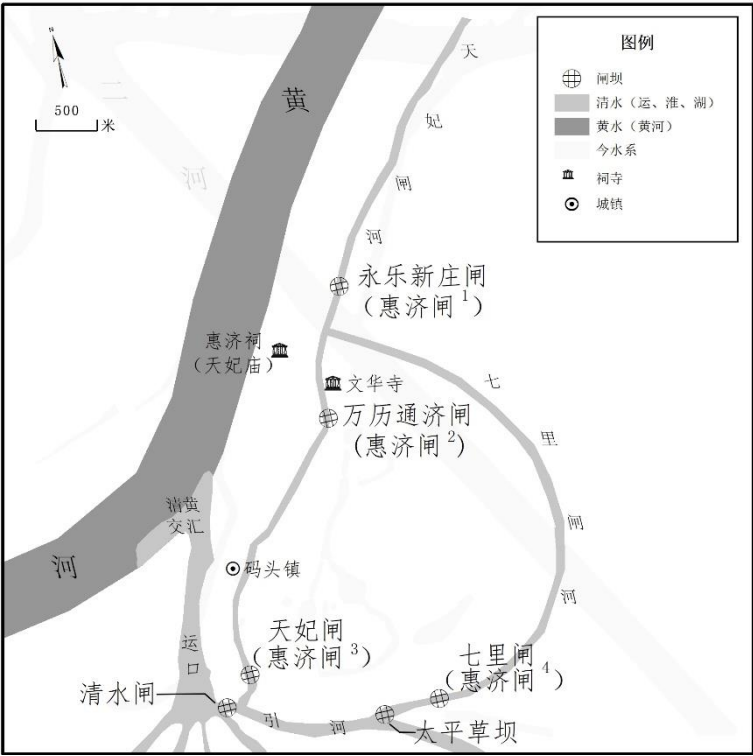


图 3 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的清口枢纽闸坝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见图 1

2. 康熙三十四年以后的河道体系与新天妃石闸的通水问题

靳辅于康熙十八年（1679）以后开挖的天妃闸河、七里闸河，事实上构成了清口地区的第一次正越河河势。但如果仅就水闸来说，此时还并无明确的主、越之分。在七里闸河因淤塞而渐趋失效后，继任总河的张鹏翮于康熙三十四年（1696）在天妃闸河之东与七里闸河之西，另外新开一条与七里闸河走势相近的新越河，

①在新越河开辟后，清口内已经事实上形成了第二次正、越河体系。②

① 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历史地理》第 6 辑，1988 年，第 67 页。
② 有关这一工程的概貌，现有研究论述甚详，兹不赘述。参见王英华：《洪泽湖-清口水利枢纽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明清时期以淮安清口为中心的黄淮运治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04-107 页。

存在讨论空间的部分，依旧是清口内的闸坝变迁细节。由于“惠济”、“天妃”等名称在靳辅治河后持续存在并混用，一些研究还存在语焉不详处。幸运的是，张鹏翮主持绘制的系列《运河全图》直观保存了地图资料。结合文献互相考异之下，可以厘清一些问题。

张鹏翮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以后继任河道总督，他在氏著《治河全书》后附录有纸本彩色《运河全图》。伴随治河过程的演进，《运河全图》出现一系列前后版本，彼此间存在微小但非常关键的差异。^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妃闸的通水与否问题。

按照大都会博物馆藏《运河全图》的描绘，天妃闸附近河道通畅，毫无阻碍。李孝聪等在《图考》一书中，据此认为这张地图的断限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以后，对应的文献依据是“天妃闸月河和月河上的天妃闸设置于康熙四十九年。”^②而事实上，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清口地区真正实施的是“改南运口永济闸为惠济越（月）闸。”^③也就是说，相关史实是闸坝的更名并非重设。另外，天妃闸附近绘制有河道，也不能等同于这一河道就是所谓的“天妃闸月河”，《图考》关于这副地图的年代断限和相关文献解读都有不妥之处。

而按照天津图书馆藏《运河全图》和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运河全图》的描绘，天妃闸附近则已经筑堤，堵塞不流。那么，这一“堵塞不流”状态的天妃闸，究竟为何物，它与康熙十八年（1679）左右设置的天妃闸又是何关系呢。另一张同样绘制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以后的张鹏翮河工图，为我们提供了暗示。如下图4（a），在该图“头草坝”以北，标识有一座写有“新天妃闸基”字样的闸坝，为封闭状态。检《行水金鉴》，对此实有记载：

“（康熙四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总河张鹏翮题……唯是天妃闸旧基闸塘，年久深洼，岸水难干，故桩碎石有碍下桩铺底，议于运口头草坝迤北，建造大石闸一座。”^④

联系图文，时间、闸名、设置地点均一致，可以断言，这座天妃闸正是新造

^① 主要版本有四种：天津图书馆藏《运河全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运河全图》、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运河全图》、大英图书馆藏《运河图》。参见李孝聪、席会东：《淮安运河图考》，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86-102页。

^② 李孝聪、席会东：《淮安运河图考》，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③ （民国）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淮系年表》表11，[出版者不详]，民国十八年（1929），第27页。

^④ （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140《运河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254页。

的天妃“大石闸”，它是康熙时期第二次正、越河体系的产物，不同于康熙十八年（1679）左右设置的第一座天妃闸。

新天妃石闸与旧天妃闸之间的关系既已辨明，最后的问题是，该闸何以在前文提到的一些河图中绘制为封闭不通。据笔者推测，新天妃石闸的不通航应该只是一种施工的非常状态，时间不长，却不巧被地图绘制者忠实记录下来。图 4(a) 中的“闸基”字样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这点，而前引大都会博物馆藏《运河全图》中，新天妃石闸附近标为通水的状态，则基本印证了这种可能性，^①见下图 4(c)。除此之外，另一些不同来源的康熙后期河图，^②同样对新天妃石闸附近标为通水，这也是有力的旁证，见下图 4(b)。^③



图 4(a) 康熙四十二年（1703），
封闭状态的“新天妃闸基”

图 4(b) 康熙四十二年（1703），通水
状态的新天妃石闸

图 4(c) 康熙四十五年（1706），通
水状态的新天妃石闸

地图说明：原图均为彩色，经笔者灰度和色阶处理，框为笔者添加。除图 4(b)为右南左北外，其他地图均为上南下北。

资料来源：各典藏机构康熙河工图^④

《图考》和《图注》等今人著作中出现的讹误，非常典型地展现了因闸坝名称不断层累和借用而形成的讹误。总结其出错路径，大致可以归纳如下：首先，因为“天妃”与“惠济”二词在各种地方文献中常常相通，进而“惠济越（月）

^① 图 4(c)中新天妃石闸通水的状态，提示该图断限应当略晚于图 4(a)，即晚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但如前文所述，又不能更晚于李孝聪等错误判断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以后，当在两年份之间。无独有偶，大都会博物馆官网将该图绘制时间断为康熙四十五年（1706），今从之。

^② 席会东：《〈王石谷全黄图〉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 年第 1 期，第 118 页。

^③ 王耀在《〈黄运河口古今图说〉图注》一书中，就新天妃石闸通水与否的问题，对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的河工图断限做了较混乱的排序，按照本文考证，应当有误。见王耀：《〈黄运河口古今图说〉图注》，图 8 至图 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1-32 页。

^④ 图 4(a)至图 4(c)，来源依次为：张鹏翮：《治河事宜》卷 9《黄河全图》，康熙四十二年（1703）刻本，郑永昌主编：《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档案图展》，台湾故宫博物院，2013 年，第 134 页；（英）大英博物馆：王石谷《全黄图》，台湾“中研院”数位方舆网，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4000043，2019 年 8 月 10 日；（美）大都会博物馆：张鹏翮《运河全图》，大都会博物馆官网，<https://images.metmuseum.org/CRDImages/as/original/DP142629.jpg>，2019 年 8 月 10 日。

闸”即“月河上的天妃闸”这种提法，便是可以接受的，这是错误出现的根源；其次，由于康熙十八年（1679）以后开凿的七里闸河与康熙三十四年（1696）以后开凿的新越河，河势都是由东南再折向西南，这在本就无绝对位置可言的清代河工图中高度近似，两者常常被地图研究者混而为一，故而，在七里闸河上设置的当时名称是七里闸的惠济闸，与在新越河上设置的当时名称是永济闸的惠济越（月）闸间彼此混淆，这正是《图考》等书对大都会博物馆藏图误判断限的关节之处；最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运口附近新建的“新天妃石闸”，依旧难免以上错讹，又被人与康熙十八年（1678）在天妃闸河上设置的旧天妃闸混淆。

通过以上分析，各闸坝的具体位置和相对关系参见上图 4 和下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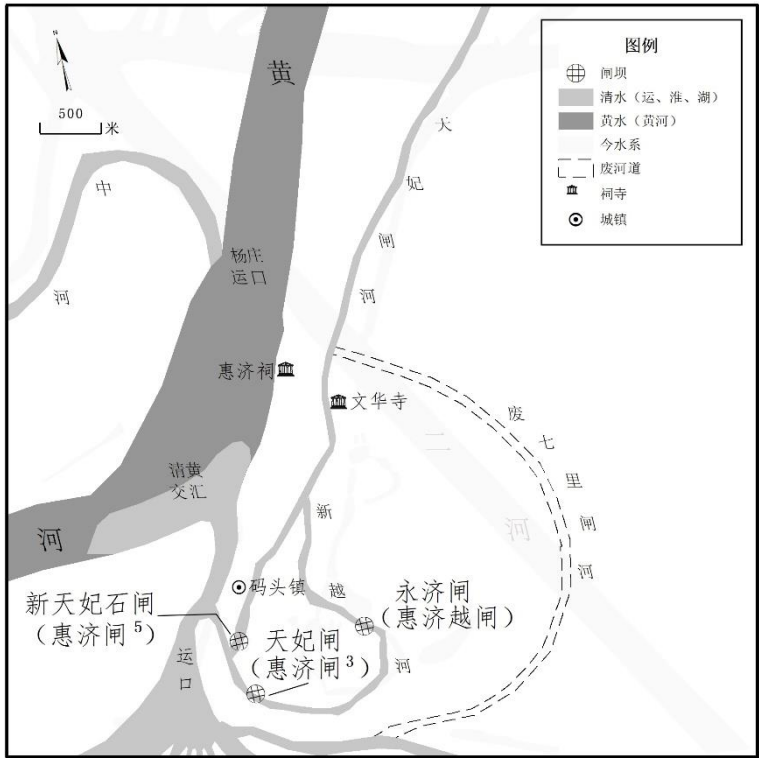


图 5 康熙三十四年（1696）以后的清口枢纽闸坝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见图 1

如以上诸般讹误，如果不用成序列并有正确断限的河工图加以综合考察，并结合当时文献的记载，往往容易导致错误在不断累积后愈加难辨。现将靳辅-张鹏翮治河前后，清口地区若干闸坝的名称等信息统列于一表，以便更加明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见下表 1。

表 1 靳辅-张鹏翮治河前后的清口地区主要闸坝

官方名称	别名	修筑时间	官方名称来源	备注
新庄闸	惠济闸 ¹	约永乐十三年（1415）	万历《淮安府志》卷 3《建置志》 ^①	\
通济闸	惠济闸 ²	万历六年（1578）	《河防一览》卷 11《查议通济闸疏》	\
太平草坝	济运坝	康熙十七年（1678）	《行水金鉴》卷 150《运河水》引《河防志》	\
天妃闸	惠济闸 ³	康熙十八年（1679）	《行水金鉴》卷 135《运河水》	\
七里闸	惠济闸 ⁴	康熙十八年（1679）	《靳文襄公奏疏》卷 2《酌改运口疏》 ^②	\
清水闸	太平闸	康熙二十三年（1684）	《靳文襄公奏疏》卷 3《经理未竣工程疏》 ^③	④
新天妃石闸	惠济闸 ⁵	康熙四十一年（1702）	《行水金鉴》卷 140《运河水》	\
永济闸	惠济越闸	康熙四十五年（1706）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引乾隆志	今址
惠济闸 ⁶	\	雍正十年（1732）	乾隆《淮安府志》卷 6《河防》 ^⑤	今址

表格说明：1. 闸名后上标为名称的出现次序；2. 前文已引用的官方名称来源，不再标注详细信息。

三、 雍乾以后葫芦状河道与“码头三闸”的形成

雍正即位后，对清口的一些改造措施，意义颇为重大。雍正十年（1732），新天妃石闸被迁徙到二草坝北岸堤内，^⑥再次改名惠济闸，上下又挑引河，形成了图 6 中的今闸址和运道。^⑦

乾隆即位之初，清口一带的工程体系日趋完善。乾隆二年（1737），新任总河高斌鉴于惠济祠边上的黄、运两河仅隔一堤，险峻异常，遂又在康熙运道以东开凿新运道，并建设通济、福兴正越四座闸坝。

^① 万历《淮安府志》卷 3《建置志》，万历元年（1573）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 8 册，上海书店，1990 年影印本，第 345 页。

^② （清）靳辅：《靳文襄公奏疏》卷 2《酌改运口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30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影印本，第 510 页。

^③ （清）靳辅：《靳文襄公奏疏》卷 3《经理未竣工程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30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影印本，第 544 页。

^④ 太平闸的名称也出现在官方文书中，与清水闸并用。

^⑤ 乾隆《淮安府志》卷 6《河防》，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397 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影印本，第 645-647 页。

^⑥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 6《川渎下》，光绪二年（1876）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55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影印本，第 891 页。

^⑦ （民国）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淮系年表》表 11，[出版者不详]，民国十八年（1929），第 3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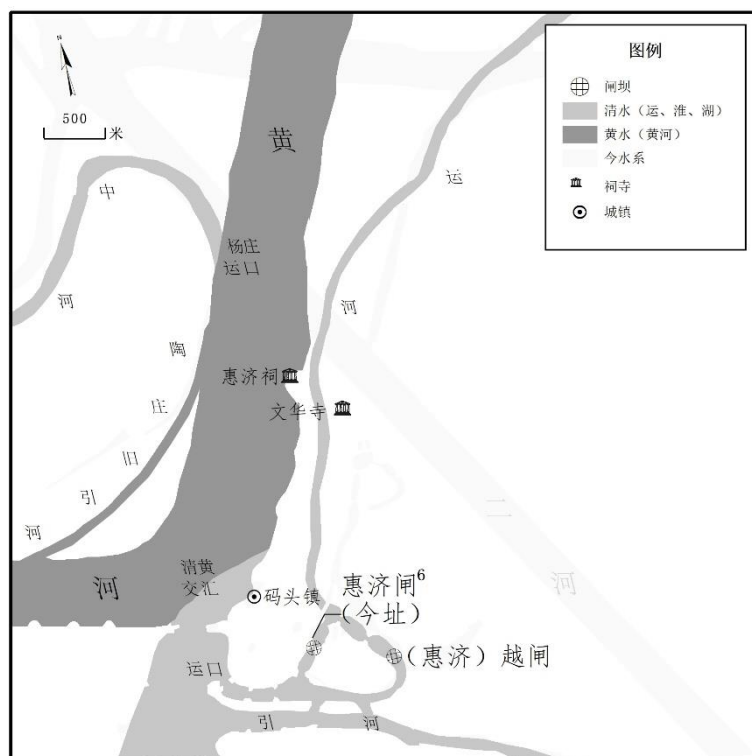


图 6 雍正十三年（1735）以后的南运口闸坝体系

资料来源：南运口闸坝体系按高斌所进河图重绘，见（清）高斌《为奏闻清口木龙有效情形折》附图 1《雍正十三年清口木龙图》，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档号（故机）005054，郑永昌主编：《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档案舆图特展》，台湾故宫博物院，2013 年，第 50 页。其余参考图 1。

在乾隆初年的河工措施完成后，清口地区俗称“码头三闸”的惠济、通济、福兴正越闸体系正式形成，三组六条的河道相互串联，彼此交通，当地人谓其形状为“U 形”，^①但更广泛的提法还是“葫芦河”。

至此，自潘季驯治河以来，因处理黄淮运关系而渐次修建的复杂闸坝体系，最终塑造完成。此后垂二百年，这一格局基本不变。^②如下图 7。

^①（民国）张煦侯著，方宏伟、王信波整理：《淮阴风土记》，方志出版社，2008 年整理本，第 372 页。

^② 王英华：《洪泽湖-清口水利枢纽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明清时期以淮安清口为中心的黄淮运治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7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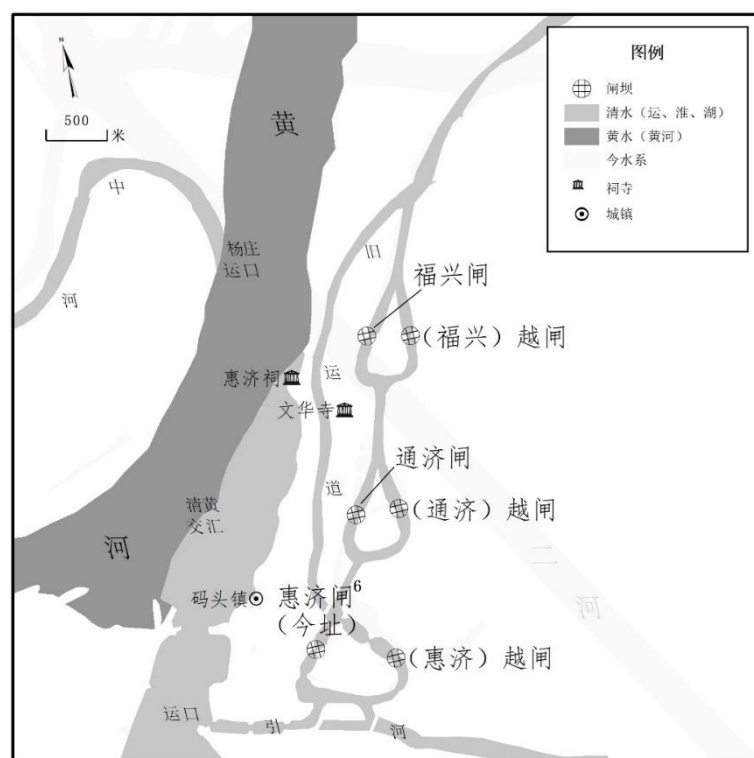


图7 乾隆十四年（1748）以后的南运口闸坝体系

资料来源：南运口闸坝体系按高斌所进河图重绘，见（清）高斌《为奏闻清口木龙有效情形折》附图3《乾隆十四年清口木龙图》，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档号（故机）005054，郑永昌主编：《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档案舆图特展》，台湾故宫博物院，2013年，第51页。其余参考图1。

四、 结论：官方命名权与民间解读权的差异

考察清口在明代后期以来的变迁，闸坝体系的旋设旋废与闸坝名称的混杂迭变是两个突出特征。这既体现了黄淮运交汇地带，因天然河势变化而形成的天然差异，也体现了官方闸坝命名权与民间闸坝解读权之间存在的人为差异。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便在闸坝系统变迁最为剧烈的清代靳辅-张鹏翮治河时期，官方河工图的相关描绘也是更新及时和逻辑自洽的，今天诸多理解上的混乱与困难，实际源于后世治河文献和乡土文献对早期记忆的覆盖。

事实上，这种差异的延绵远不止于本文搁笔的乾隆年间。据笔者在淮阴区码头镇的实地走访，至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惠济越闸已被当地居民称为“头闸”，意为通航主闸，惠济正闸反倒被称为“备闸”，通济正、越闸和福兴正、越闸也有相似的境遇。其中曲折，还俟后来者深究。